

命运共同体建设视角下的 澜湄国家产业变迁研究

刘峻玮

摘要：二战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东盟国家在此背景下，不断整合资源与政策，扩大区域影响力，努力构建区域产业合作和区域经济网络。作为东盟重要组成部分的湄公河国家面临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任务。从产业变迁规律的角度来看，湄公河国家具有承接中国、日本、美国等国产业调整和产业转移的基础。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推进，为提升湄公河国家经济实力，促进各国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如果能推动湄公河国家的产业变迁，不仅会推动湄公河国家的工业化，促进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改变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现状，更能极大地改善中国与湄公河国家面临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从根本上保障湄公河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全。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澜湄国家产业变迁还存在湄公河国家治理水平有限、相关国家对中国的意识形态的误读、乌克兰危机及其长期化导致全球供应链断裂和经济脱钩加剧等困境。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最优途径是推动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在产业上的融合，形成一定梯度的产业结构，推动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产业变迁。

关键词：命运共同体；澜湄国家；产业变迁；区域经济一体化

收稿日期：2024—04—22

作者简介：刘峻玮（1997—），深圳汇丰银行经济分析师，主要研究领域：东南亚经济。

近年来，中国提出并持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多层次、多形式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新的方案。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地处中南半岛，位于“一带”和“一路”交汇的枢纽位置，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战略支点。2016年3月23日，柬埔寨、中国、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即“澜湄国家”，以下简称“六国”）提出共同建设“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多年来，六国在澜湄合作启动之初确定的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和减贫为五个优先方向以及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为三大合作支柱来共同建设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取得了诸多成果。相比中国周边的其他区域，湄公河国家与中国有较强的合作需求与较低的系统性风险，在政府引导、多方参与和项目为本的模式下，澜湄合作体现出高效优质的“澜湄效率”，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前期成果、奠定了未来持续推进的坚实基础。

在中国的外交布局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从周边起步。作为周边命运共同体重要组成部分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是其中的关键一步。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产业变迁是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最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湄公河地区是诸多经济合作机制竞合^①的舞台，但都缺乏在产业方面的深度合作，也就无法实现更高质量的区域经济合作及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从内部来看，湄公河国家在产业发展上呈现出一定的阶梯性，这是湄公河地区产业变迁的基础条件；从外部来看，印度、日本、美国和中国在推动湄公河地区的产业变迁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和劣势，且都主导了湄公河地区的一些合作机制。从澜湄合作多年来确定并持续推动的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和减贫五个优先方向以及全球产业变迁的规律和现实来看，中国和湄公河国家共同推动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不仅具备产业变迁的最大可能性，也最可能从这些诸多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突围出来，成为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动力。

^① 卢光盛、金珍：《超越拥堵：澜湄合作机制的发展路径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7期，第98—99页。

一、核心概念辨析

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构想，是基于习近平总书记应对国际复杂挑战、着眼于世界前途和人类发展提出的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在产业变迁方面，有学者从政策角度提出中国要在东南亚地区实现产业梯度转移要做好统筹谋划。^①因此，基于上述研究基础，在辨析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和产业变迁概念的基础上，本文将对如何通过产业变迁的方式建设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一）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在湄公河地区的具体化和表现，是中国在新时期推动与湄公河国家在区域经济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的新型区域合作机制和倡议。

在2016年3月23日发布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三亚宣言——打造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上，澜湄六国第一次正式提出了“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我们一致认为澜湄合作将在‘领导人引领、全方位覆盖、各部门参与’的架构下，按照政府引导、多方参与、项目为本的模式运作，旨在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树立为以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②。2017年3月23日，在澜湄合作启动一周年之际，王毅外长指出，一年来，澜湄六国“本着平等协商的精神，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缩小发展差距，携手打造团结互助、平等协商、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③。2018年1月10日，澜湄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发表了《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旨在促进澜湄沿岸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增进各国人民福祉，缩小本区域发展差距，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④2020年2月20日，澜湄合作第五次外长会再次重申了澜湄合作将在协商一致、平等相待、相互协商和协调、自愿参与、

① 李东晋：《深化粤港澳大湾区面向东南亚对接合作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和产业梯度转移统筹谋划》，《现代管理科学》，2019年第7期，第46—48页。

②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三亚宣言（全文）》，新华网，2016年3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3/23/c_1118422397.htm，访问时间：2023年12月12日。

③ 王毅：《大力推进澜湄合作，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7年3月23日，<http://www.fmprc.gov.cn/web/wjzbzhd/t1448115.shtml>，访问时间：2024年1月12日。

④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人民日报》，2018年1月11日，第9版。

共建、共享的基础上，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树立新型国际关系典范。^①面对新冠肺炎感染，2020年8月24日，在澜湄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上，澜湄国家宣布加强公共卫生合作，应对新冠肺炎感染挑战和确保经济社会复苏，密切成员国疾控中心及地区相关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共同维护成员国人民健康、生命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②

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产业变迁是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最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从第一次正式提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至今，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不断推进和深化。

（二）产业变迁及其作用

产业变迁（Industrial Change）已有较为成熟的定义，它“既是单个产业形成、扩张、成熟与衰退的过程，又是产业系统内各产业之间关系、地位的替代和调整的过程”。^③产业变迁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影响是基础性的和长期性的。产业变迁不仅是产业在空间上的变迁，还包含产业转型、产业转移和产业合作等方面内容。

在产业变迁的实践中，产业转型、产业转移和产业合作通常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尤其是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变迁，促进了区域的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产业变迁既可以发生在一国内部，也经常在不同国家之间发生。在不同国家的产业变迁往往会通过世界和地区经济格局的变化、产业分工的调整和产业价值链的重构，改变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

产业变迁与区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经济学中主要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梯度理论、区域经济发展辐射理论、区域经济发展增长极理论、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理论等。这些理论从不同方面解释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框架，但最终都需要落实到产业变迁上。比如源自瑞典经济学家卡尔·冈纳·迈达尔（Karl Gunnar Myrdal）的梯度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在生产分布上必然会带来两种趋势，即生产向某些地区集中的极化趋势和生产向广大地

① 《澜湄合作第五次外长会联合新闻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20年2月21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zbzhd/t1748082.shtml>，访问时间：2023年1月12日。

②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万象宣言（全文）》，中国政府网，2020年8月24日，http://www.gov.cn/xinwen/2020-08/24/content_5537090.htm，访问时间：2023年1月12日。

③ 何立胜：《制度创新与产业变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区分散的扩展趋势；前者受极化效应支配，后者受扩展效应支配。因此，产业在空间上的变迁实际上决定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区域经济学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按水平划分，有特惠关税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①六个依次递进的类型。从内部来看，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通过产业变迁的方式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从外部来看，中国和湄公河国家在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下已经建成了自由贸易区，具备了进行产业变迁的制度化条件。从产业变迁的角度来看，如果区域合作不能在产业层面完成一体化，不仅其合作的效果将会大打折扣，而且合作也难以有效维持。

（三）产业变迁与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

二战后，包括湄公河国家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先后进行了多次工业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技术和高质量的人才等原因，各国都未能实现工业化和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同时，从经济基础的角度来看，当前全球正经历第三次工业革命深入发展的阶段（信息化和智能化阶段），促使区域经济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全球产业从美国、日本、中国等国逐渐向包括湄公河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能够从这次全球产业变迁过程中承接产业转移的国家，不仅会增强与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更能从这轮全球产业变迁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

在湄公河地区的诸多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2015年11月，柬埔寨、中国、老挝、缅甸、泰国和越南六国建立的澜湄合作机制为湄公河国家进行新一轮的工业化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机遇。湄公河地区是世界上较早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地区之一，具备朝着承接全球产业转移和构建命运共同体方向发展的基础和潜力。现阶段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仍然面临诸多问题，至少还有下列三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目的是实现类似于欧盟的那种全面的区域一体化，还是只是六国应对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变迁的应景之作？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物质共同体，还是精神共同体？澜湄国家之间未来的联系是仍仅限于贸易往来，还是深度的产业合作乃至产业融合？

因此，本文提出，在全球产业变迁发展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澜湄合作需加深合作层次并突破现有合作框架，以实现澜湄国家的产

^① 高洪深：《区域经济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

业融合为目的，才能最终实现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

二、澜湄国家产业变迁的时代机遇

现阶段，国内外学者对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精神、思想和文化层面，也有学者指出共同体更应当是利益的共同体。但是，究竟怎么样的利益、哪些利益构成了共同体赖以存在、深化的基础，学者们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角度来看，某个区域在合作过程中的深化要依赖于深层次的产业合作，甚至是产业的融合。澜湄国家在多方面具备这样的基础和时代机遇。

（一）湄公河国家产业变迁的基础

包括湄公河国家在内的东盟国家一直都具有非常强烈的产业变迁的制度和意识基础，是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积极力量。早期东盟工业合作在培育区域经济合作意识、构建经济合作与协调机制、加强技术进步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①二战后，包括湄公河国家在内的东南亚国家已经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但多数东南亚国家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仍然处于从属地位，位于价值链的低端，难以实现由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的递进^②。

在东盟内部，工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湄公河国家中只有泰国拥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其他湄公河国家仍然属于传统的农业国。在这种情况下，湄公河国家和东盟实现工业化实际上不存在政治方面的内部障碍。吴桂林等利用计量经济学中的熵权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定量的方法，对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在2006—2015年的资源和经济发展耦合状况进行了评价，认为各国均未能达到资源承载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良好匹配，难以形成可持续、稳定的发展模式。^③

在经济安全方面，湄公河国家普遍缺乏完整的工业体系，而“缺

① 沈红芳等：《东南亚的工业化、外国直接投资与科技进步》，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5页。

② 刘慧月：《东南亚国家产业转移的演进：路径选择与结构优化》，《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3期，第29—45页。

③ 吴桂林、李克强、吕燕：《“一带一路”背景下东南亚澜湄合作国家资源承载与经济发

乏强大的工业基础不仅意味着国家的贫穷落后，而且还会遭受外国干预和控制的威胁”^①。在现阶段，湄公河地区的合作主要是贸易合作^②，而不是产业变迁。无论是在制度竞合，还是在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参与湄公河地区诸多合作的国家和机制都能进行一定程度的供给，但其有效程度和可持续性不同。当前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已经进入第三个十年发展阶段，它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从相对较为单纯的经济合作向更为全面、综合和深入的区域合作或一体化进行转型、升级。^③然而，澜湄国家诸多问题的解决（如贫困、就业、经济持续增长等）不仅需要各国和各种机制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更需要切实地从经济基础的角度，通过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善澜湄国家经济发展的落后面貌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现状。因此，湄公河国家亟需通过产业变迁和优化经济结构等方式，实现经济提质增量和推动社会发展。

（二）相关国家在湄公河地区地缘政治经济中的博弈

从欧洲、北美等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实践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需要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国家直接推动和参与，在区域层面构建具有一定层次性和差异性的产业结构。从产业变迁规律上来看，产业变迁需要在区域层面形成良好的分工。当前，印度、日本、美国和中国在湄公河国家实施产业变迁的优势和劣势十分明显。

第一，印度具有语言与信息技术优势，但工业化程度不足。印度是湄公河国家周边唯一将英语列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人类历史上的三次产业革命（主要是工业革命）主要是由使用英语的英国和美国发起和推动的。因此，英语的语言霸权在世界产业变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当今，许多工业上的先进技术和专利、跨国企业的工作用语都是以英文为主要语言。主流的电子计算机系统的编程语言和90%以上互联网信息语言都是英语，这也是造就印度软件业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主要原因。

印度的主要劣势是工业不够发达。印度从尼赫鲁时代就一直致力

^① 罗伯特·W.考克斯著，林华译：《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② 相关研究可以参见：骆永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洋产业合作》，《国际研究参考》，2018年第2期，第30—36页；王芳等：《东南亚—中国香蕉产业经济格局变化及思考》，《中国热带农业》，2017年第1期，第12—18页。

^③ 卢光盛：《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与GMS合作的深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130页。

于将自己建设成为“有声有色”大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印度实际上已经成为南亚地区无可争议的大国，但是在南亚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印度不仅参与不够，而且政治影响也难以与其他大国相比，根本原因在于印度经济总量虽与其他大国相比毫不逊色，但是工业体系发展缓慢，尤其在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因此，在湄公河地区的产业变迁中，印度自身的优势在于语言等“软优势”，而缺乏强有力的“硬优势”。

第二，日本对湄公河国家熟悉，又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在多方面要强于印度、中国甚至是美国。日本对湄公河地区的经济合作是最早的，加之日本在二战中曾经入侵多个湄公河国家，对这些国家的状况十分熟悉，而且在二战后与这些国家在多方面进行了合作，大湄公河区域合作也是由日本主导的、运行效果较好的地区合作机制。日本是东亚地区除中国和韩国以外的工业体系最为完整的国家，而且从全球范围看，日本的技术优势也仅次于美国。20世纪80年代，日本以“雁阵理论”推动东亚、东南亚市场资源整合，希望打造以日本为核心，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作为产业配套基地，东南亚和中国大陆作为生产组装基地的国际产业链。^①日本的劣势也是十分突出，但主要是相对劣势，与中国相比体现在，日本不与湄公河地区接壤，与湄公河地区的产业合作可能不是那么迫切，导致日本在与湄公河国家的合作中更强调项目合作，而不是产业合作。

第三，美国具有参与湄公河国家产业变迁的全面优势。美国是第一农业大国、第一工业大国和第一服务业大国，具有在产业、技术、话语权和影响力等软硬方面的全面优势。但是，在全球经济中心转移和特朗普“将制造业搬回美国”战略影响下，美国对湄公河地区区域合作、产业转移的意愿在下降，美国的全面优势也无法有效地转化为对湄公河地区合作机制进行升级的动力。

第四，中国以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和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参与湄公河国家产业变迁。中国无疑在湄公河地区的产业变迁中占据地缘优势等“硬优势”。中国提出了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和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建设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必然是以澜湄合作为基础的然而，东南亚地区长期是日本首先炮制的“中国威胁论”的最大市场，这对中国形象是一种严重的损害。在对外经济政策上，中国强

^① 李东晋：《深化粤港澳大湾区面向东南亚对接合作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和产业梯度转移统筹谋划》，《现代管理科学》，2019年第7期，第46页。

调开放国际市场，支持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但是湄公河地区一些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甚至是经济民粹主义较为强烈，中国的经济发展策略如何与之碰撞，仍需要时间检验。

综上所述，具备产业转移能力和产业合作的国家主要是日本、美国和中国。这三个国家在湄公河地区既具有产业变迁的能力和基础，同时也分别主导了一个或数个合作机制，具备产业变迁的途径。

（三）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转移

产业变迁具有其内在的规律，尤其是二战后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变迁都与产业变迁主导国家的产业政策紧密联系。产业政策与产业经济学的概念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最先出现于日本，代表人物有筱原三平、马均正雄、宫泽健一和佐贯利雄等。随着产业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产业变迁的概念也逐渐被提出来，同时产业政策与产业变迁之间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产业变迁这个较为纯粹的经济概念逐渐增加了更多的政治因素，尤其是当产业变迁发生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政治因素的影响就更为突出。传统的产业变迁理论侧重于对产业增长和产业结构变迁的研究（即产业转型），但对产业在不同国家的分布（即产业转移）和产业合作的研究较少。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产业门类齐全、产业结构较为合理的国家。在理论上，产业变迁一般遵循一定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产业变迁的路径依赖主要是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与约翰·贝茨·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两位经济学家提出的配第一克拉克定理，该路径以产业变迁的要素之一，即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方向为视角，认为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之一是需求因素，商品的收入弹性差异导致商品的相对需求发生变化，农产品的相对需求随着人均收入增加而减小，工业品的相对需求先升后降，最后让位于服务业。

在经济上，澜湄国家中，只有中国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具备在湄公河地区进行产业变迁的能力；在区域合作的顶层设计上，中国提出了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也为湄公河地区的产业变迁提供了政策基础。在地缘上，工业变迁需要在临近地区开展，以便形成所谓的集群效应；在区域合作和产业变迁的形式上，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在跨境园区与境外园区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这些园区是诸多产业集聚的重要载体，大量企业

在园区的聚集不仅促进了产业分工，还能有效地创造聚集力，通过共享资源、克服外部负效应，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从而有效地推动产业集群的形成；中国在产业园区建设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在国内不仅有15000多个各种类型的产业园区，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达到了30%以上。^①

（四）产业变迁与东盟共同体的衔接

近年来，东盟一直试图继续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核心或领导地位，并着手通过继续领导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方式加强其领导地位。为此，东盟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东盟国家作为中小国家，既要实现所有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更要与亚太地区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建立更为深刻的联系，最终实现亚太经济一体化。

东盟共同体是东盟国家推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步骤，是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继续推动建立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有利条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我国对外商谈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自由贸易区，2002年开始实施“早期收获”项目，于2010年建成。^②2015年，东盟宣布已经建成东盟共同体，该共同体包括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三大支柱，经济共同体是基础。但实际上，东盟共同体与欧盟相比在一体化程度、应对共同问题、共同外交政策等方面相差甚远，其共同体水分较大。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如此描述生产的国际化与世界市场的形成：“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③

当前，东盟经济共同体仍然停留在国际经济模式，而非世界经济模式，因为“国际经济模式的重点在于交换，而世界经济模式的重点则在于生产”^④。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在当前难以从生产方面实现区域一体化。因此，寻求外部力量建设东盟经济共同体，产业变迁是必经之路。湄公河国家同属于东盟的成员，在澜湄合作升级到澜湄国家

① 郑敏仪：《2019年中国产业园行业概览》，头豹研究院，2020年12月，第9页。

② 林海、张海森：《南南合作促进区域贸易和减贫：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案例》，李小云、吴忠、徐进编：《南南合作：中国的实践与贡献》，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版，第5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④ 罗伯特·W.考克斯著，林华译：《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页。

命运共同体建设过程中，东盟既可以是参与者，也可以是东盟寻求更高一体化进程的路径。

中国与东盟的合作由来已久，中国和东盟国家已有多个经济合作平台，如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国—东盟电子商务论坛、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等。同时，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 年愿景》指导下，双方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的对接合作等方面已经达成了一致。2019 年 9 月 24 日，在第 16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印尼再次担任主题国，印尼总统特使、海洋统筹部部长卢胡特（Luhut Binsar Pandjaitan）表示，经济合作是东盟—中国之间战略合作的关键动力。

四、澜湄国家产业变迁的当代价值

从当前情况来看，中国提出的澜湄命运共同体已经得到了湄公河国家的响应，对于中国和湄公河国家来说，产业变迁对澜湄合作、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价值会逐渐显现。

（一）促进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重商主义认为，各国都能在贸易中获利。当代世界产业变迁的总体趋势是从产业集群到产业分工细化，再到产业合作制度化。这三个新趋势背后是产业变迁的三部曲：产业合作、产业融合、产业一体化。

从理念上来说，湄公河国家之前所有的产业变迁都是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策。前文所述一些学者对中国参与湄公河地区经济合作的意图忽视了中国提出“共同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比如中国和老挝联合开发的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这是列入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合作中的早期收获项目。这个项目由中老两国联合成立的老中联合投资有限公司（简称“LCC”）开发，在出资上体现了中老两国共同发展的理念：LCC 由云南海投与老挝万象市政府共同出资组建，公司股本总额为 1.28 亿美元，其中云南海投出资 9800 万美元，占股本总额的 75%；万象市政府出资 3000 万美元，占股本总额的 25%。投资这些产业对于促进老挝农业的现代化、夯实制造业的基础和完善服务业运行都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因此，对于老挝来说，中国的园区建设不仅仅是拉动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促进老挝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传统产业的现代化，这是其他合作机制所不能提供的。

欧盟一体化的案例已经清楚表明，高层次的共同体需要建立在经济的高度一体化上，通过产业变迁实现经济一体化是已经被证明了的可行途径。相反的案例是英国脱欧，其经济原因在于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远远不能与法国、德国等大陆国家相比。因此，对于澜湄国家来说，产业变迁的价值性首先在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二）从根本上保障湄公河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安全

虽然湄公河国家都是中小国家，但湄公河地区历来又是大国博弈的关键，属于陆海复合地区，是世界上主要陆上大国和海洋大国的力量交汇和地缘政治经济博弈的主要地区之一。卡尔·米德勒顿（Carl Middleton）和吉米·阿罗彻（Jeremy Allouche）认为中国参与澜湄合作有与西方争夺战略资源筹码的考虑。^①在经济安全方面，湄公河国家普遍缺乏完整的工业体系，而“缺乏强大的工业基础不仅意味着国家的贫穷落后，而且还会遭受外国干预和控制的威胁”^②。因此，一些湄公河国家将维持地区的均势作为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

湄公河国家大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面临着推动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 and 促进就业等问题。虽然湄公河地区经济总体上较为落后，但是自然生态环境保存较为完整。一些环保主义团体和人士担心过度的经济开发会损害当地的自然环境。中国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在经济合作中不仅强调对合作对象的经济价值，而且更加重视环境保护。

（三）构筑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

冷战后，包括澜湄国家在内的东南亚国家都选择加强同中国的经贸关系以实现经济快速发展。^③湄公河地区诸多机制拥堵的状况与澜湄国家的这种策略有极大的关系。格里格里·雷蒙德（Gregory V. Raymond）认为中国在地区影响力的增加可能与泰国在地区的优势形

① Carl Middleton and Jeremy Allouche, “Watershed or Powershed? Critical Hydro Politics, China and the Lancang-Mekong Cooperation Framework,”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51, No. 3, 2016, pp. 100-117.

② 罗伯特·W.考克斯著，林华译：《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

③ 陈宇：《“印太地缘政治张力”与东南亚国家对冲战略的限度》，《国际关系研究》，2021年第4期，第112页。

成竞争。^①

产业变迁是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二战后，产业转移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导致全球价值链在地理空间上快速扩展，在北美、欧洲和东亚分别形成了以美国、德国和中国为核心的地区生产网络，^②其中以德国为核心的地区生产网络构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后来欧盟迈向全面一体化的地区经济基础。欧盟成功的一体化进程不仅动摇了美国霸权的经济基础，还重塑了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

由此可见，区域内的产业变迁是区域一体化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贸易战、当前中美贸易战和欧洲与美国的贸易争端背后的经济原因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新兴战略产业的变迁。这些变化不仅为澜湄国家间的产业变迁提供了条件，更有利于构筑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

五、澜湄国家产业变迁的现实困境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澜湄国家产业变迁还存在诸多现实困境。

第一，湄公河国家治理水平有限。由于湄公河国家政府治理水平普遍较低，湄公河地区长期社会治安混乱，存在形式和内容多样复杂的非传统安全隐患，位于缅甸、老挝、泰国三国交界的“金三角”地区是走私毒品、贩卖人口、捕杀野生动物、军事武器贩卖和非法走私、跨境赌博等犯罪行为猖獗之地，也是整个中南半岛社会治安的隐患。个别湄公河国家存在的民族地方武装、极端主义问题，还有普遍存在的水资源争端和环境治理、公共卫生防治等问题，对外来投资者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

由于湄公河地区不同国家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类型及威胁程度有所差异，各国政府所重视程度也不一致，^③所以该地区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国际合作通常难以实现，也成为澜湄国家开展高层次国际合作所直面的难题。比如在生态环境安全敏感度高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规模征用土地资源，从规划、施工到运营都面临当地政府

^① Gregory V. Raymond, "Competing Logics: Between Thai Sovereignty and the China Model in 2018," in Daljit Singh, Malcolm Cook,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Vol. 1,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 2019, pp. 341-358.

^② 管传靖:《全球价值链扩展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变革》,《外交评论》,2018年第6期,第32页。

^③ 潘一宁:《非传统安全与中国—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关系——以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开发问题为例》,《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第32页。

更为严苛的环评监管和行政阻碍。

第二，相关国家对中国意识形态的误读。中国以理念、价值等表现的意识形态话语传播和国际话语权获得了提升。基于此，长期以来在国际主流话语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了国家为了维护意识形态霸权和国家利益，经常出现恶意曲解中国经济发展理念的声音。随之而来的便是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对于中国在澜湄次区域涉及经济、政治、安全、教育文化与卫生、能源等领域的议题进行故意污蔑和抹黑，进而欲图将中国描述成霸凌周边小国的强权国家。

西方媒体是在湄公河地区更是将湄公河水资源安全化，宣扬“债务陷阱”论等错误言论。在西方话语主导“攻势”下，相关媒体和湄公河国家的相关涉华报道会将命运共同体理念扭曲为“民族主义”“理想主义”和“中国主义”等充满了傲慢和偏见的称谓。基于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由于被曲解而遭受不同程度的质疑，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大国能力都不被信任，甚至还有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写入国际公约和付诸实践的声音。^①因此，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西方话语占主导的湄公河国家社会中同样存在被误解的情况。

第三，乌克兰危机长期化冲击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当前，乌克兰危机及其长期化对全球经济格局和秩序的深远影响正在逐渐发酵，对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一定的冲击。

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加剧全球供应链断裂和经济脱钩。俄罗斯作为世界意义的大国正面临美国及西方盟友“总动员”式的史无前例的制裁。俄罗斯央行资产被美国及西方盟友冻结，重要原材料和钢铁、飞机零部件和高科技产品也被禁止对俄出口，以及俄罗斯银行被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ociety for Worldwide Interbank Financial Telecommunication，简称“SWIFT”）国际结算系统，美西方企业被禁止在俄罗斯投资，包括肯德基、麦当劳、苹果和谷歌等大型跨国企业都不惜经济损失纷纷撤出俄罗斯市场。可见，俄乌冲突及美国和西方盟友对俄罗斯的制裁，是地缘政治冲突演变而来的西方权力资源的集体运用和整合，在这样的形势下，与美西方持相似立场和理念的国家也将加入制裁队伍，比如东南亚国家中参与对俄制裁的新加坡等国。这也意味着，俄罗斯作为世界性化石能源出口国，在全球供应链断裂分化的同时，也能和持不同立场的“友好”和“非友好”国家进行能源贸易，进而改变地区贸易格局。同时，政治乃至军事冲突冲击经济

^① Angela Poh and Mingjiang Li, “A China in Transition: The Rhetoric and Substance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 *Asian Security*, Vol. 13, No. 2, 2017, p. 9.

相互依赖关系结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特别是美西方冻结俄罗斯央行美元准备货币的行径，将迫使全球各国思考美元和 SWIFT 的可靠性，进而促进类似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G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简称“CIPS”）作为人民币国际化主要平台的发展，这对湄公河地区国家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也必将产生深远影响。

乌克兰危机将加速全球经济重心东移。美国及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将加速俄罗斯经济全面东进，亚洲作为全球经济最活跃、最具潜力地区的地位得以进一步稳固，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潜力将进一步提升，中俄之间、俄罗斯—东盟之间的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地缘经济结构也将发生变化。

乌克兰危机使多边贸易体系继续受到冲击。美西方国家以“国家安全例外”为由，取消了俄罗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最惠国待遇，违反了世贸组织的非歧视性原则，进而前所未有地冲击了多边贸易体系。这一背弃多边贸易主义的取向也预示着包括澜湄次区域在内，西方国家主导推行的集团政治在全球多边机构大行其道，“国家安全”概念的泛化和滥用，也冲击了全球贸易规则，使得世界各国在发展对外贸易联系的同时加剧避免经济依赖成为权力源泉的担忧意识。政治互信关系在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主导性增强，进一步说明，全球贸易规则将更多让位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也将主要取决于地区国家间的政治与安全关系，而澜湄区域地缘经济结构也将承受更大的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乌克兰危机也加大了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的滞胀风险。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全球化石能源、玉米和小麦等价格飙升。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会萎缩。从中长期来看，乌克兰危机和美西方的经济制裁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将远远超过乌克兰危机本身。与澜湄区域地缘经济结构密切相关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市场运行和多边贸易规则被冲击，未来澜湄次区域的经济增长和合作潜力释放也会因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变得暗淡和更加不确定。

六、结语

二战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的两个重要趋势，是世界性大国和世界性经济体保持在产业、技术等方面领先的重要方面。而且，在区域经济合作支持下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两个过程深入发展，是欧美主要大国强化区域乃至全球影响力，

构建区域性产业合作、区域性经济网络的主要策略。

湄公河地区乃至亚太地区作为全球性大国和地区性大国进行地缘政治经济竞逐的重要地区，其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一直非常缓慢。湄公河地区优越的自然地缘环境与复杂的人文地理环境，使任何一个大国都无法单独地主导该地区的各项事务；加之湄公河国家历来有维持大国影响的“平衡外交”策略，湄公河地区成为全球范围内地缘政治经济状况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如何推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从产业变迁的路径推动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是较好的方向。

湄公河地区面临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历史任务，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推进，为提升湄公河国家经济实力，促进各国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如果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能推动湄公河国家的产业变迁，不仅会实现湄公河国家的工业化，更能极大地改善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地缘政治经济环境。

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已经取得一系列的前期成果。澜湄合作作为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共同参与、建设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经历了从无到有、快速发展的过程。澜湄合作自成立以来，在机制建设、项目合作、战略规划、资金支持等务实合作方面均取得了成就。未来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最优途径是推动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在产业上的融合，形成一定梯度的产业结构，构建类似于欧盟和北美地区的区域性产业合作、区域性经济网络，实现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的产业变迁，是推动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成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先行者和领导者的重要环节和步骤。

[责任编辑：李丽]